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障碍及消减对策分析*

——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杨继平

【摘要】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障碍主要包括就业歧视/赋能与收入性障碍、属地化管理与公共品供给障碍、传统观念束缚与文化融合障碍等三个层面，以此来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障碍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因子分析方法对长株潭城市群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障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相比于就业歧视/赋能与收入性障碍，属地化管理与公共品供给障碍、传统观念束缚与文化融合障碍是长株潭城市群新生代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社会的主要成因。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障碍与地区发展水平具有直接关联，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则越不利于其融入城市社会。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障碍；消减对策；长株潭城市群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 — 5833 (2016) 12 — 084 — 8

农民工伴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而产生和不断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农民工的主体和主力军。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首次在 2010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出现，表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新生代农民工问题^①。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农业和农村的特征减少，城市的特征明显增加，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不仅是为了挣钱，而且更向往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对尊重、平等和社会承认有更多的企盼。新生代农民工由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转型成为逐渐脱离土地和农业而独立于城市之中的新的阶层和利益团体，其发展变化趋势直接决定了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主流农民工的特征和境况^②。由于受制于计划经济时代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惯性影响以及与之相关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的制度性障碍^③，新生代农民工在与其它利益团体博弈当中属于游离于城市主流社会的边缘弱势群体，在就业和权益保障等方面仍然面临着很多

作者简介：杨继平，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副教授（湖南湘潭 411201）

收稿日期：2016 - 07 - 25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城乡经济和谐发展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研究——以长株潭为例”（项目编号：10YJA790220）、湖南省软科学项目“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与城市经济和谐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010ZK3024）的阶段成果。

¹ ①一般而言，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成长与农村地区，并在进入劳动年龄后涌入城市务工，但没有取得城市户籍的劳动者。

②李培林、田丰：《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态度和行为选择》，《社会》2011 年第 3 期。

③Silver H. “Social Exclusion and Social Solidarity”, International Labor Review, 133 (5), 1994, pp. 531-579.

④吴伟平、刘乃全：《异质性公共支出对劳动力迁移的门槛效应：理论模型与经验分析》，《财贸经济》2016 年第 3 期。

问题，如工资水平低下、欠薪现象严重、劳动安全卫生条件较差、农民工身份转换难、社会保障待遇普遍缺失、基本享受不到城市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等等^①。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尽快地得到有效改变，中国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变和扭转，也就不可能实现全社会的和谐。

有关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障碍问题，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展开了研究。大部分学者从资本要素禀赋视角进行了探讨，具体考察了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资本与人力资本障碍，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因其资本禀赋存量之阙如与配比之失调而呈现同化、分离或边缘化的趋向^②。部分学者从公共服务视角展开了分析，具体考察了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机制、属地化管理体制下的公共服务配给机制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障碍的影响，并认为公共品或公共服务的歧视性分配政策是造成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障碍的重要原因^③。此外，也有学者从文化与身份认同视角展开探讨，发现城乡文化二元结构是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障碍的重要因素，而且新生代农民工身份也会影响其城市融入^④。基于此，本文首先从就业与收入、公共品供给以及文化等三个层面解析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障碍的生成逻辑，然后构建城市融入障碍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因子分析方法对长株潭城市群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障碍进行实证检验，最后提出具体的消减对策，为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提供参考。

一、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障碍的生成逻辑

根据社会适应理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逻辑起点就是进入城市，逻辑终点就是边缘化、分离、同化或者融合等四种情境^⑤。其中，同化、分离、边缘化均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障碍的不同表现。同化是指新生代农民工始终处于客观主从关系下的单向融入状态，最终被流入地社会所接纳，成为流入地城市的社会成员之一。分离是指在资本要素禀赋差异下，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行为、价值、身份以及心理等方面形成互不认同且相互抵触的状态。边缘化是指渴望融入城市社会的新生代农民工难以获得流入地城市社会的认可，同时又丢失了自身的文化与身份认同感，最终陷入“邯郸学步”式的迷惘之中，成为城市的边缘人。从同化、分离以及边缘化的具体表现来看，城市融入障碍生成的内在原因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就业歧视/赋能与收入性障碍、属地化管理与公共品供给障碍、传统观念束缚与文化融合障碍。

² ①徐至寒、金太军、徐枫：《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路径的障碍及其消解——基于资本要素禀赋的视角》，《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6年第1期；张宏如、李群：《员工帮助计划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模型——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还是心理资本》，《管理世界》2015年第6期；王春超、叶琴：《中国农民工多维贫困的演进——基于收入与教育维度的考察》，《经济研究》2014年第12期；谢桂华：《中国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回报与社会融合》，《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

②王文周、康凯恒：《进城务工人员社会融入状况及其障碍》，《经济研究参考》2014年第19期；李梅香：《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评估——基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的视角》，《财政研究》2011年第2期。

③Algan Y., Bisin A., Manning A., Verdier T., Cultural Integration og Immigrants in Europ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Grpsjean P., “The Weight of History on European Cultural Integration :A Gravity Approac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1(3), 2011, pp. 504-508; 邓玮：《话语赋权：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新路径》，《中国行政管理》2016年第3期；杨菊花：《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④Berry J. W.,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 African Studies Review, 17(2), 1980, pp. 79-88.

⑤刘程：《资本建构、资本转换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中国青年研究》2012年第8期。

⑥杨风、燕浩扬：《失地农民城市融入的障碍与路径——以山东省为例》，《农村经济》2015年第5期。

（一）就业歧视/赋能与收入性障碍

新生代农民工在择业就业中的歧视以及在工作中所表现出的收入性障碍，共同构成了其在城市融入过程中的经济资本缺失^⑤。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分割进一步衍生为二元就业制度，并造就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新生代农民工在惯性歧视与政策排斥下，被迫从事着一些劳动报酬低、福利待遇差、工作环境恶劣且职业声望较弱的次属劳动力市场^⑥。较低水平的工作报酬提示了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选择上的被动性与过滤性，以及在收入来源上的锁定性和收入区间上的限制性。这种就业歧视和收入性障碍一定程度上来源于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上的低能循环与自致匮乏，尤其是外部赋能不足而导致的自我增值能力低下。在高流动社会中，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入地城市从事着劳动附加值低、工作强韧度大且岗位替代性强的职业，这种工作职业地位及收入报酬严重地限制了其经济实力与时间精力，使其难以获得优质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以致于陷入“低人力资本——低附加值劳动——低人力资本投资”的恶性循环。

（二）属地化管理与公共品供给障碍

属地即工作管辖范围或是工作区域，属地特性有着明确的范围界限、具体的管理对象以及清晰的标准和要求。属地化管理体制下，城市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是地方政府，各地方政府按照地域和行政界限进行事权划分，地方政府配置公共资源的重要原则是以行政管辖为边界、以户籍人口为基数^⑦。因此，在传统的属地化管理体制下，地方政府不明确地负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的责任。步入高流动社会后，即使中央政府关于事权责任进行了重新划分，但是地方政府依然具有按照户籍人口进行公共资源配制的激励，以至于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流于形式，新生代农民工的公共品或公共服务供需失衡问题也不断加剧^⑧。可见，属地化管理体制与高流动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直接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公共品供给障碍的出现，从而成为影响其融入城市社会的重要阻碍^⑨。

（三）传统观念束缚与文化融合障碍

在城乡二元体制下，传统城乡分割观念普遍并长期存在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群体中，成为阻碍其城市融入的重要成因。出于经济利益、公共服务供给以及城市管理等方面的考虑，地方政府在发展地方经济和社会时，通常只愿意将原有市民纳入，而排斥农民工。这种来自地方政府的传统城乡分割观念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合，使他们成为城市社会的边缘人。另外，城市本地居民也会在观念上挤压和排斥农民工。在城市本地居民看来，农民工不仅总体素质低下，而且工作习惯和生活习惯较差，影响城市品质与生活秩序。所以，新生代农民工总是难以获取城市本地居民的心理与身份认同，更是难以享受到城市的发展利好^⑩。除此之外，新生代农民工难以摒弃农村地区的传统文化、主体意识和习俗，不能自觉改变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这种来自文化层面的观念和意识也是影响其完全融入城市的重要障碍。

³ ①吴伟平、刘乃全：《属地化管理下流动人口公共服务供需匹配优化研究》，《上海经济研究》2016年第7期。

②周建明：《高流动社会与属地化管理体制下的公共产品供给》，《学术月刊》2014年第2期。

③甘行琼、刘大帅、胡朋飞：《流动人口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地方政府财政激励实证研究》，《财贸经济》2015年第10期。

④Chantal Lacroix, *Immigrants, Literature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Plagrave Macmillan UK, 2010.

⑤杨凤、燕浩扬：《失地农民城市融入的障碍与路径——以山东省为例》，《农村经济》2015年第5期。

⑥徐至寒、金太军、徐枫：《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路径的障碍及其消解——基于资本要素察赋的视角》，《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6年第1期。

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障碍的实证检验

如上所述，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障碍生成的内在原因具体表现在就业与收入、公共品供给以及文化等三个层面。那么，在现实实际中，到底哪种融入障碍是主导性因素，还需要借助于实证方法进行深入考察。本文选择长株潭城市群作为典型案例地，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障碍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问卷调查与访谈的方式获取分析数据，最终利用因子分析方法实证考察长株潭城市群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主要障碍。

（一）指标设定与数据来源

考虑到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障碍生成的内在原因具体表现在就业歧视 / 赋能与收入性障碍、属地化管理与公共品供给障碍、传统观念束缚与文化融合障碍等三个方面，所以本文从上述三个层面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障碍的评价指标体系。在指标体系构建时，具体参照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中心“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 社会融合与心理健康个人问卷”以及杨凤和燕浩扬^⑤、徐至寒等^⑥的思路。其中，就业歧视 / 赋能与收入性障碍评价指标具体包括职业身份、收入差距、工作压力、就业歧视、就业平等性、职业教育以及技能培训等 7 项；属地化管理与公共品供给障碍评价指标具体包括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居住条件、子女教育以及公共卫生等 8 项；传统观念束缚与文化融合障碍评价指标具体包括教育理念、价值观念、文化差异、传统习俗、卫生习惯、衣着打扮、社会看法以及生活方式等 8 项。

本文对三类评价指标具体采用李克特五分量表法编制问卷，其中，“1”为很差，“2”为比较差，“3”为一般/无法确定，“4”为比较好，“5”为很好。另外，本研究选择长株潭城市群作为典型案例地，具体的调研地为长沙市的芙蓉区、天心区、岳麓区、开福区、雨花区以及望城区，株洲市的天元区、荷塘区、芦淞区、石峰区以及云龙示范区，湘潭市的雨湖区、岳塘区以及湘潭县。具体调研对象为在当地居住一个月以上新生代农民工，问卷发放时间为 2015 年 4—9 月。具体的抽样方式为分层抽样方法，即每个调研区抽取 400 个样本，14 个调研区共抽取 5600 个样本。共发放问卷 5600 份，收回问卷 5489 份，有效问卷为 5277 份，分别占发放问卷总数的 98.02 %与 94.23 %。各评价指标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见表 1。

表 1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障碍的评价指标体系

维度	评价指标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就业歧视/赋能与收入性障碍	职业身份	A1	2.57	0.53
	收入差距	A2	2.86	0.56
	工作压力	A3	4.01	0.38
	就业歧视	A4	2.27	0.43
	就业平等性	A5	2.83	0.54
	职业教育	A6	2.68	0.48
	技能培训	A7	2.71	0.18
属地化管理与公共品供给障碍	失业保险	B1	2.14	0.53
	工伤保险	B2	3.17	0.64
	生育保险	B3	3.02	0.54
	养老保险	B4	3.15	0.45
	医疗保险	B5	2.84	0.52
	居住条件	B6	3.87	0.61
	子女教育	B7	2.62	0.54
	公共卫生	B8	4.05	0.48
传统观念束缚与文化融合障碍	教育理念	C1	4.14	0.63
	价值观念	C2	3.87	0.57
	文化差异	C3	2.79	0.44
	传统习俗	C4	2.65	0.42
	卫生习惯	C5	3.87	0.51
	衣着打扮	C6	3.32	0.50
	社会看法	C7	2.79	0.38
	生活方式	C8	3.14	0.53

（二）长株潭城市群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障碍的因子分析

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障碍的评价指标较多，所以，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对各维度指标进行归并。在进行结构维度测算前，首先需要检验各维度指标的因子分析适用性。研究表明，三类评价指标的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值和 KMO 检验值分别为 5621.89 和 0.71、5214.21 和 0.68、5231.66 和 0.67，说明上述三类结构维度指标适用于因子分析方法。然后，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分别计算得到三类结构维度指标变量的因子特征值与方差贡献率，同时将初始因子载荷矩阵按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进行旋转，以此得到旋转后的三类结构维度指数变量的因子得分系数矩阵。表 2—表 4 分别报告了各评价指标的因子载荷及因子得分。检验结果显示，就业歧视/赋能与收入性障碍评价指标变量提取了 2 个主要因子，累积可解释 75.88 % 的信息；属地化管理与公共品供给障碍评价指标变量提取了 3 个主要因子，累积可解释 77.81 % 的信息；传统观念束缚与文化融合障碍评价指标变量提取了 3 个主要因子，累积可解释 77.83 % 的信息。

表 2 就业歧视/赋能与收入性障碍评价指标的因子载荷及得分

	因子载荷		因子得分	
	F ₁	F ₂	F ₁	F ₂
A ₁	0.142	0.127	0.058	0.032
A ₂	0.119	0.135	0.021	0.074
A ₃	0.064	0.047	0.044	0.021
A ₄	0.050	0.036	0.032	0.033
A ₅	0.107	0.125	0.037	0.118
A ₆	0.044	0.124	0.075	0.028
A ₇	0.103	0.017	0.107	0.117
特征值	2.969	1.422	—	—
方差贡献率(%)	46.132	29.753	—	—

注：提取方法为主成份法，采用具有 Kaiser 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下表同。

表 3 属地化管理与公共品供给障碍评价指标的因子载荷及得分

	因子载荷			因子得分		
	F ₁	F ₂	F ₃	F ₁	F ₂	F ₃
B ₁	0.083	0.037	0.045	0.047	0.107	0.040
B ₂	0.066	0.045	0.217	0.039	0.048	0.105
B ₃	0.053	0.038	0.045	0.050	0.056	0.015
B ₄	0.114	0.024	0.046	0.081	0.079	0.105
B ₅	0.103	0.032	0.051	0.281	0.048	0.109
B ₆	0.085	0.019	0.041	0.272	0.079	0.111
B ₇	0.047	0.037	0.121	0.283	0.022	0.062
B ₈	0.038	0.045	0.059	0.280	0.023	0.058
特征值	3.357	2.654	1.458	—	—	—
方差贡献率(%)	37.980	25.785	14.044	—	—	—

表 4 传统观念束缚与文化融合障碍评价指标的因子载荷及得分

	因子载荷			因子得分		
	F ₁	F ₂	F ₃	F ₁	F ₂	F ₃
C ₁	0.112	0.044	0.045	0.053	0.015	0.106
C ₂	0.104	0.042	0.028	0.032	0.114	0.065
C ₃	0.068	0.075	0.023	0.061	0.320	0.102
C ₄	0.102	0.165	0.104	0.101	0.328	0.073
C ₅	0.074	0.073	0.103	0.055	0.331	0.054
C ₆	0.073	0.038	0.127	0.075	0.241	0.071
C ₇	0.114	0.074	0.066	0.081	0.109	0.065
C ₈	0.066	0.075	0.127	0.039	0.108	0.105
特征值	3.563	2.177	1.458	—	—	—
方差贡献率(%)	36.011	27.137	14.684	—	—	—

（三）长株潭城市群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障碍比较与讨论

利用就业歧视 / 赋能与收入性障碍、属地化管理与公共品供给障碍、传统观念束缚与文化融合障碍评价指标的因子得分，可以进一步计算得到长沙、株洲、湘潭市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障碍结构维度指标的综合评价得分（表 5）。分析结果表明：长沙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就业歧视 / 赋能与收入性障碍、属地化管理与公共品供给障碍、传统观念束缚与文化融合障碍的综合评价得分分别为 3.90、3.56、3.16；株洲地区三类指标得分分别为 4.09、3.78、3.42；湘潭地区分别为 4.32、4.01、3.64。

从纵向比较来看，长沙、株洲、湘潭等地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就业歧视 / 赋能与收入性障碍评价得分均高于属地化管理与公共品供给障碍、传统观念束缚与文化融合障碍，而且传统观念束缚与文化融合障碍的综合评价得分均最低。由此说明就业歧视 / 赋能与收入性因素对长株潭城市群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阻碍作用最低，属地化管理与公共品供给因素次之，而来自传统观念束缚与文化融合因素的影响最大。其主要原因是，长株潭城市群的城乡二元分割所导致的就业二元结构并不突出，以致于该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能够获取较理想且较稳定的工作。而且，长株潭城市群的就业工资平均水平不高且差异性低，也是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歧视 / 赋能与收入性障碍维度评价较高的重要原因。后两种类型的障碍对长株潭城市群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阻碍作用较高，是因为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子女教育等公共资源在目前还难以实现异地配置。

从横向比较来看，长沙地区在三类结构维度指标的综合评价上得分最低，株洲地区次之，湘潭地区最高。由此说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的障碍越强。这是因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其城镇化水平通常越高，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分割越是明显，不利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城乡二元分割的特征越不明显，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本地居民间的差异性较低甚至不明显。可见，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障碍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具有直接关联，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通常越是不利于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

表 5 长株潭城市群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障碍的结构维度比较

地区	统计值	就业歧视/赋能与收入性障碍	属地化管理与公共品供给障碍	传统观念束缚与文化融合障碍
长沙	均值	3.897	3.563	3.155
	标准差	1.021	0.987	0.854
株洲	均值	4.092	3.782	3.421
	标准差	1.415	1.311	0.998
湘潭	均值	4.321	4.011	3.643
	标准差	1.214	1.012	0.892

三、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障碍的消减对策

在现行制度体制下，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面临着制度性、经济性、社会性、文化性以及自身方面的障碍，已成为一个函待解决的综合性问题。消减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障碍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具体包括倒逼结构性制度改革，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肃清制度障碍；注重自身增能与外部赋能，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完善社会支持网络，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人文关怀；倡导先进文化与共有价值，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培育软环境。

（一）倒逼结构性制度改革，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肃清制度障碍

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新生代农民工的辛勤付出与努力贡献。但是，由于诸如户籍制度、劳动就业体制、教育体制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等的制约，新生代农民工群体难以享受到与流入地城市居民同等的各项政策利好。从本质上讲，阻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根本障碍在于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体制。如果中国现行的二元户籍制度不进行根本性变革，那么新生代农民工就会一直处于走出农村却进不去城市的游离状态，而难以彻底地融入城市社会。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户籍制度改革已经迈开了步子，并且一直处于探索前进的境况，但户籍制度、社保制度、教育制度尚未发生根本性变革。因此，在当前这个处于改革攻坚关键时期，推进城市化进程、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需要积极进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顶层制度设计，不断进行结构性制度改革和体制变革，从而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突破制度束缚、消除体制瓶颈。

（二）注重自身增能与外部赋能，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

经济融合是新生代农民工走出农村、进入城市，并保持生活稳定的基础性条件。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经济融合的关键在于提升其人力资本，并通过加大外部赋能以激活其自身增能和自致能力，进而实现与流入地城市居民的人力资本互融。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第一，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促进地区教育资源均等化，从源头上削弱新生代农民工遭受的功能性社会排斥，弱化公共教育资源对城市本地居民的偏向性配置；第二，健全并完善义务教育“两为主方针”，保证流入地城市的公办学校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子女义务教育收费和管理与当地户籍学生同等对待，以此为新生代农民工在居住地就近接受义务教育提供制度保障；第三，构建多元化的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机制，加强地方政府对公益性培训服务机构和有偿性技能培训机构的资本支持、技术支持；第四，增进新生代农民工主动接受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的意识，努力打破培训市场与就业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的壁垒，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与创业提供支撑。

（三）完善社会支持网络，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人文关怀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合离不开社会网络支持以及社会性互动。新生代农民工离开故土而进入一个几乎完全陌生的城市社会，失去了其原本熟悉的社会网络与生活环境。与此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失去了原本由流出地政府提供的各种社会保障与服务。社会网络以及社会人文关怀的缺失，使得新生代农民工长期游走于城市边缘而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因此，建立一种以社会关系网、城市社区、流入地企业以及政府相结合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支持综合性网络具有现实依据。除此之外，还要积极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城市社会公共活动和社区文体活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与流入地城市居民的良性互动，以此增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人文关怀。最后，努力探索并推动流动人口社会管理模式变革，促进流动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以及拥有与流入地城市居民权利平等，并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发展且与流动人口社会管理相适应的体制机制，以此增进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人文关怀。

（四）倡导先进文化与共有价值，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培育软环境

传统观念束缚与文化融合障碍是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低效的重要成因。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本地居民相异文化范式使得流入地城市的整体文化在撕裂中呈现出碎片化特征，难以正常发挥文化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作用，相反可能加大了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本地居民的社会分离几率。培育先进文化与共有价值，加强文化建设、引导核心价值并整合文化资源，有助于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创造软环境。首先，有意识地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主体重构，以此消减城乡不同文化间的界限与隔阂，从而缓解新生代农民工与流入地城市居民间的文化冲突。其次，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建设投入，充分挖掘新生代农民工可为流入地城市居民借鉴与学习的文化资本。与此同时，促进流入地城市象征性、独有性文化的传承，以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感染。最后，进一步强化思想与文化教育、价值引导以及典型示范作用，充分发挥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能动性，引导并激励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心理等层面积极融入城市。